

我说河洛文化

闽南人根在河洛

□徐金星



闽南人“根在河洛”，河洛文化乃闽南文化之源，这与客家人、客家文化是相同的。有资料显示，今天闽南人主要生活在福建、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，约5000万人。闽南，概指以泉州、漳州、厦门“金三角”为中心的福建南部地区。当年迁入福建南部的中原汉人，将当地的两条河水分别称作“晋江”和“洛阳江”，以寄托他们对晋王朝和京洛洛阳的无限怀念。后在洛阳江上修洛阳桥，明代重修时，郡守孙明让曾为之记，记文中就有“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”的话。

福建开发史上，有三次移民高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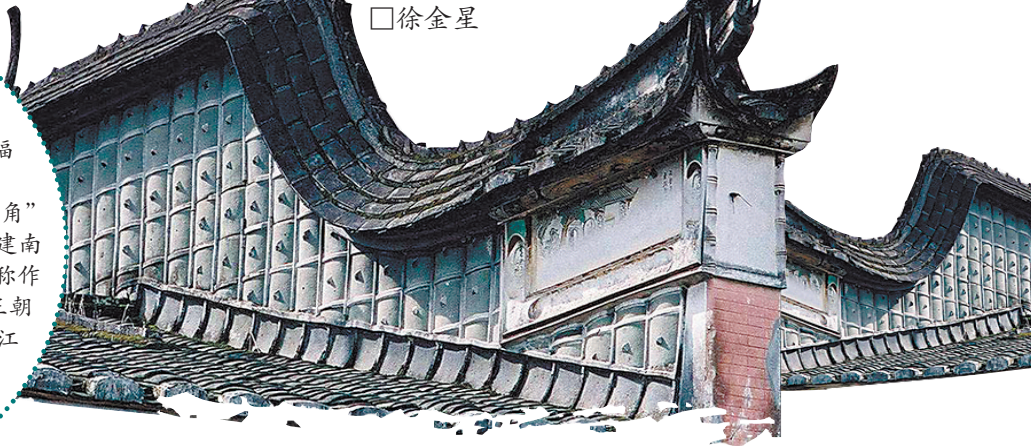
研究者一般认为，在福建开发史上，曾经有三次移民高潮。

第一次，《晋书》云：“俄而洛京倾覆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云：“时海内大乱，独江东差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。”西晋八王之乱、永嘉之乱、五胡乱华，加上自然灾害给洛阳、河洛和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灾难，多数汉人难以生存下去，纷纷南迁，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浪潮，这便是今日各地闽南人（以及客家人）的第一批先民。

关于此次南迁人数，翦伯赞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载：“到达长江流域的至少有70万人，另有20万人没有到达长江，聚居在今山东境内。”谭其骧《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》载，从永嘉之乱到拓跋焘攻宋，北方人口南迁将近百万。依《晋书·地理志》所辖地域一尸户口计，共有八口七百余万，则南渡人口九十万，占其八分之一强。陈寅恪说：“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（《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）。”

第二次，唐高宗总章二年（公元669年），泉州、潮州一带发生“蛮獠啸乱”，唐王朝令陈政率领军兵3600人出泉州、潮州一带平乱。陈政去世后，其子陈元光袭位，最终平定了暴乱。垂拱二年（公元686年），陈元光奏请于泉、潮二州间设漳州，武则天（时驻都洛阳）册建漳州及属县，陈元光任刺史。南唐昭宗十三年（公元1143年）陈元光被追封为“开漳圣王”。

第三次，黄巢起义、唐末战乱，光州固始王潮、王审知率兵5000人南下，于唐僖宗光启元年（公元885年）进入闽南，先后占领泉州、福州等。王潮死，弟王审知继位。公元933年，王审知之子王延钧称帝，定都于长乐（今福州市），国号闽。



台湾先住民即“河洛郎”

这三次汉人入闽高潮，第一次以洛阳为中心，第二、第三次以光州固始为主。那么光州固始和河洛地区是什么关系呢？

光州，南朝梁置，地处今河南省东南部一带。固始县，唐、宋时属光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隶属信阳市，现为河南省直管县。清代乾隆《光州志·附余卷之四·光州志略序》云：唐之光州（包括固始县），“北枕汝颍，东护淮风，南带齐安，西接申唐，盖河洛之奥区，戍守之要壤”。文中的“盖河洛之奥区”，是说包括固始县在内的光州地域，是河洛地区（或河洛文化圈）极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可以看出，光州以及固始县和河洛地区、河洛文化的密切关系。

福建和台湾，隔海峡相望。从古代起，两岸就有了联系和交往。清代曾设台湾府，隶属福建省，后又改设台湾省。

闽南文化与河洛文化一脉相承

闽南人、台湾人所讲的“闽南话”，为我国汉语八大方言之一（“客家话”也为八大方言之一。今天的“洛阳话”属八大方言之一的“北方话”，与闽南话、客家话是不同的），流行于福建省、广东省部分地区、海南省部分地区、台湾地区（台湾超过80%的人讲闽南话），也流行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中。

唐代诗人张籍《永嘉行》云：“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晋语。”这里的“晋语”就是西晋时以京都洛阳为中心地域的河洛话。1986年出版的《泉州文化》第二期载，中原汉人在西晋永嘉之乱后大规模南移入闽，带来了中原汉语，它为闽南话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，故闽南话又有“河洛话”之称。又说：泉州话在语言、词汇乃至语法方面都直接继承

了六朝（指东吴、东晋、南朝宋、南朝齐、南朝梁、南朝陈）时中州一带的河洛官话。有研究者还指出，闽南话“依旧保有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分阴阳‘四声八调’的‘汉语基因’，是世界上最优美、最典雅、最复杂的语言”，“台湾话是从中原河洛地区辗转万里经闽南流传到台湾的古汉语”（谢魁源、马永涛《河洛文化在台湾》）。

闽南文化、台湾文化，包括哲学、文学艺术、民间信仰、民风民俗等都是与河洛文化一脉相承的。例如，今日台湾唯一的“歌仔戏”，即为当年的河洛戏，“歌仔戏”每周定时在电视台播出，场景标题“河洛大舞台”（卢博文《由中原渡海来台神明谈台湾与河洛文化的渊源》）。

400多年前，福建人开始移民海外，或到台湾，或到东南亚。清初，泉州南安人郑成功收复台湾，大批闽南人随之迁台；康熙年间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统一台湾，又有大批福建人迁台。台湾现有2300万人，基本由三部分构成：原住民、先住民、新住民。其中的“原住民”，主要是高山族，约占台湾总人口的2%，他们大多是古代大陆沿海百越族的后裔。“先住民”，即闽南人、客家人，超过今日台湾居民的80%，这是台湾的主体居民（其中，超过4/5为闽南人，近1/5为客家人）。所谓本省人、台湾人，即指“先住民”，也即闽南人、客家人，他们自称“河洛郎”。所谓“台湾话”，即指“闽南话”，台湾人也称为“河洛话”。“新住民”则指1949年随国民党迁入台湾者，约占总人口的12%。

洛阳的风流才子

七律高峰 千古风流

——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

□朱宏卿

李商隐（公元813年—约公元858年），字义山，怀州河南（今河南沁阳）人。大和三年（公元829年），全家移居洛阳。他三岁丧父，随母过着清贫生活。

他初学古文，以文才得到牛僧孺赏识，二十五岁考中进士。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，让他做书记，并将女儿嫁给他。他一直在朋党之争的夹缝中生活。他诗文俱佳，创无题诗，朦胧诗影响后世。现有存诗六万多首，有《李义山诗集》《樊南文集》。他死后，友人崔珣写诗悼念：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……”

竞争夹缝中的生活

晚唐中后期，藩镇割据，宦官专权、朋党之争极为激烈。李商隐的父亲李嗣正本任获嘉县令，日子还算优渥。李商隐三岁时，李嗣正去世，之后，他随母亲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。他少年聪慧，极爱读书。移居洛阳后，认识了白居易、令狐楚等文学大家，白居易教他写诗，令狐楚亲自教授以今体（骈体）奏章之学，他大有长进。

此时牛党执政，令狐楚是牛党中人。他十分欣赏李商隐的才华，聘他入幕为巡官，随之去邠州、太原等地。开成二年（公元837年），经过长期刻苦学习，李商隐中了进士，从此应该顺风顺水一路风光前行了，但不久令狐楚死了。

之后，李商隐入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官府，为幕僚。王茂元看李商隐文才超群，做事干练，人品端庄，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。这样，牛、李两党都有恩于他。

开成二年，李党掌权，李商隐受到攻击，说他“忘恩负义”“行为不端”，“乃不堪之人也”，因而受到排挤和打击。会昌二年（公元842年），唐宣宗即位，牛党得势，李商隐终于结束了“十年京师寒且饿”的生活，回到洛阳。在洛阳他写诗作文，不再企求做官，四十五岁即病死洛阳。

在夹缝中生活一生的李商隐，到了最后，只剩下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感叹了！

登上讽喻诗的高峰

生活的不幸，王朝的败落，让李商隐的诗充满凄凉、悲愤、哀怨和惋惜之情。如《曲江》：“望断平时翠辇过，空闻子夜鬼悲歌。金舆不返倾城色，玉殿犹沉下苑波。死忆华亭闻唳鹤，老忧王室泣铜驼。天荒地变心虽折，若比伤春意未多。”通过江畔夜鬼悲歌、华亭唳鹤的描写，反映了晚唐的宦官发动“甘露之变”惨杀六七百人的场景，一方面反映诗人伤春之情，另一方面表现出国家将亡的隐忧。

《马嵬》更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。“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空闻虎旅传宵柝，无复鸡人报晓筹。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。”马嵬，指咸阳西马嵬坡，安史之乱爆发，玄宗携杨玉环等西逃，至马嵬，军队不再前进，强逼玄宗让贵妃吊死。繁华盛世何在？当时的局势何存？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誓词哪里去了？不治理国家，不关心百姓，一味追求享受和腐败，下场只能如此。

李商隐创作的此类抒情之诗极多，构思凝练、取材精当，巧妙地历史与现实融合，深刻地揭示出讽刺对象的本质，具有很高的典型性与艺术性，将创作推向讽喻诗的高峰。

婉约唯美的七律

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，尤其是七言律诗。他是继杜甫之后，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。

李商隐创造了无题诗和以一首诗为第一句为题目的新型诗。他的爱情诗写的哀怨缠绵，如写给妻子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感情细腻，意境婉约，为感伤唯美的典型。

《无题》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。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这首诗极为巧妙：相见时的“难”，为其他原因干扰之故；分别时的“难”，为难割难舍之原因，以“春蚕”之“丝”喻“思”，以“蜡炬”之“泪”喻相思之“泪”，令人叹为观止！

李商隐的朦胧诗最具代表性的是《锦瑟》：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看似写的爱情，但难以理解，“无端”是五十弦，而每一弦又各有寄托；接着写几个典故，寓意在何？难做定论。

卖油茶



“油茶”是古代“糊涂茶”的改进版，其最大的特点是香。过去，元宵节有喝“糊涂茶”的习俗，家家户户都把粉米面（把小米碾成面粉）或者把麦子面放在锅里炒成“炒面”，然后拌到锅里制成面汤称为“糊涂”。

以前，卖油茶是一种挺走俏的生意。油茶可以在饭铺儿里坐摊儿销售，也可以走街串巷叫卖。卖家儿肩上挎一个大油茶壶，手提一个大竹篮子，里面装着十个八个白底蓝花碗，还有调羹勺儿之类的餐具。

想吃嘴儿的人们围了上来，卖家儿把大油茶壶放在住户门口的“上马石”上，取出竹篮子里的碗，倒出油茶。买主接过去，几口就喝完了…… 胡树青文/图

牡丹文化节已落下帷幕，但这些“牡丹”可随时观赏——

“盛开”在文物上的牡丹

第35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已落下帷幕。“二十日”的“花开花落”，总是那么短暂，那么令人意犹未尽。但是，来不及赏花的游客也不要遗憾，文物上的“牡丹”已盛开千年，同样美不胜收。

永不凋谢的“牡丹”

从我市考古发现看，牡丹纹饰始于唐代，北宋宫廷和民间使用广泛。这些牡丹纹饰或雕刻在古建筑构件上，或藏在墓室壁画中，或出现于石刻文物上，或跃动在瓷器等器物上，形神逼真，堪比真花。

古建筑中的牡丹有木雕和砖雕两种。木雕牡丹在关林庙及山陕会馆、潞泽会馆等古建筑中多见，砖雕牡丹主要见于北宋仿木结构砖室墓、清代木结构建筑屋脊和琉璃照壁。

我市出土的墓室壁画上的牡丹，见于宋元时期墓葬；石刻牡丹图案，多见于洛阳唐代石墓门、墓志边饰及宋代石棺。

瓷器上盛行牡丹纹饰，被视为繁荣昌盛、美好幸福的象征。这些牡丹纹饰或图案，以绚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，寓意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、源远流长。

“唐代以来，牡丹成为工艺美术品的装饰题材。宋代的定窑、耀州窑、磁州窑等陶瓷上，广泛采用牡丹纹，装饰方法以刻画花、白地黑花为主，一般为单朵，花瓣丰满。清代、近代陈设瓷，多为百花满地装饰，在花瓶、盘、碗中多见。”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说。



这些牡丹文物值得一看

宋代三彩牡丹纹枕

该牡丹枕为宋代文物，长32厘米，宽19.5厘米，高11厘米，枕面饰单瓣棕黄色牡丹花，花蕊呈绿、白色，绿色叶子环绕四周，光泽明艳。该文物目前在河洛文明展第三展厅展出。

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，从隋唐起，牡丹图案开始作为瓷枕装饰出现，唐代以后开始批量生产，北宋时期进入繁荣期，造型丰富，象征对美好生活的祝愿。（图2）

宋珍珠地牡丹纹瓷枕

该牡丹纹瓷枕枕面呈椭圆形，四壁微内收，枕面及四壁呈淡黄色，以珍珠纹为地，饰牡丹纹及牡丹图案，纹饰线条流畅简约，造型饱满。该文物目前在河洛文明展第三展厅展出。（图4）

宋白釉剔花牡丹纹瓷罐

从唐代开始，人们对纯白色的瓷器青睐有加，工匠便对釉的成分进行工艺革新，把釉中含有的金属成分完全析出，烧制纯正的白釉瓷器。唐代、五代及两宋时期，那窑、巩县窑和定窑都以烧造白瓷著称。这件剔花牡丹纹白瓷罐瓷质细腻，釉色纯净，剔花刀法娴熟，线条流畅，一朵素雅的牡丹花跃然呈现，是北方窑系难得的白瓷精品。该文物目前在河洛文明展第三展厅展出。（图3）

北宋二十四孝画像石棺

该石棺为北宋时期，1958年出土于孟津县张盘村，棺体用单线勾勒牡丹、仙鹤、祥云和二十四孝故事图。石棺顶部的牡丹花雕刻细致精美，花朵硕大。该文物目前在古代石刻馆展出。

宋代白釉黑花鸭戏纹梅瓶

该文物1970年出土于宜阳县东王庄涧沟村，高42.8厘米，口径3.1厘米，底径10.5厘米。小口短颈，上腹略鼓，下腹渐收，小平底。周身施白釉，绘黑彩，肩部饰牡丹花枝，腹中部有开光，中部饰牡丹和双鸭戏水纹，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。梅瓶的主题纹饰是牡丹花，枝叶缠绕其间，仅态万方，是洛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之一。该文物目前在洛阳博物馆珍宝馆展出。（图1）

清代宫廷牡丹图插屏

在洛阳博物馆宫廷文物馆内，有一幅出自于慈禧的“代笔”画师——宫廷女画师缪嘉惠所绘制的清代宫廷牡丹图插屏。该牡丹图插屏底座为牡丹纹饰，上面装饰着精美的花鸟小品，最右边一幅为牡丹图，虽然历时百余年，依然笔法清晰，色泽鲜亮。

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胡寅文/图